

国际视野与中国实践: 体育跨国史研究探骊

茹亚伟, 曾允菁, 刘波

(清华大学 体育部, 北京 100084)

【摘要】:近年来跨国史借鉴全球史跨文化研究理念,形成一股学术风潮,方兴未艾。主张以跨国史研究范式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代表人物入江昭,以非政府行为体以及文化交流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认为在传统地缘政治关系之外存在另外一种人类共同体。研究认为,由于体育的跨文化以及非政府属性,对体育跨国行为的研究能够补充以往地缘政治构建的国际关系,呈现更加完整的国际关系史全貌。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学术界代表性研究成果的内容进行分析,与以往地缘政治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凸显从体育跨国史视角研究国际关系的价值。研究结果显示,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体育跨国史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这对中国学术界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学术界在借鉴跨国史研究范式时,应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依靠多国、多层次档案为研究支撑,结合已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对体育史这一新研究范式进行有益探索。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体育跨国史;国际关系史;体育外交;非政府跨国体育行为;体育民间交流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2)04-0108-11

DOI: 10.15877/j.cnki.nsic.20220629.001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东西方关系缓和,全球化进程加快,跨国事务显著增加。对跨国事务的历史溯源,很难从单一“民族—国家”的角度解释清楚。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历史学界主张从跨国视角重新解读美国历史,这不仅是学术界对全球化的现实观照,也是对已落窠臼的美国历史“例外论”的学术反思^[1]。除了观照现实以外,跨国史研究理论层面的意义在于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近代以来,西方凭借工业化与资本的优势向全世界扩张,引领世界的发展方向。历史学专业化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有其存在的合理性^[2]。但“民族—国家”范式主导的西方国家历史书写不可避免地将西方文明视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产生文明优越论,忽视其他文明的贡献,否认文明互鉴。为了从理论上论证西方文明并非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唯一主导力量,主张突破“民族—国家”书写范式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与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应运而生。这一研究风潮从美国扩展至全球,深刻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国史”书写,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

现代体育作为一项人类共有的财富,具有跨越物理边界以及政治障碍的功能。在观照现实回望历史的学术理念引领下,非政府体育跨国行为与国际关系形成的互动引发学界思考,为此国际学术界开始了“体育跨国史”的研究探索。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双边体育跨国交往。徐国琦在《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中认为,中美两国的体育交流历史是两国体育“共有的历史”的重要内容。Sayuri Guthrie-shimizu的《跨越太平洋的梦想:战争以及和平时期美日之间的棒球相遇》,论述了棒球在太平洋两岸形成的体育跨国网络。第二,区域间体育跨国交往。Stefan Huebner的《泛亚洲运动会以及现代亚洲的兴起(1913—1974)》,阐释了亚洲国家在彼此地缘政治相互冲突的语境下,通过亚洲区域间的国际运动会构建亚洲身份认同。第三,全球性体育跨国交往。Barbara J.

收稿日期: 2022-04-20

作者简介: 茹亚伟(1987—),女,河南新乡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体育史。

通信作者: 刘波(1971—),男,山东青岛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管理。

Keys的《全球化的体育: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对抗以及国际共同体》,阐释了国际奥委会以及国际足联在国际关系急剧恶化的20世纪30年代,促成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进行同场竞技。本文旨在通过追溯体育跨国史研究的范式来源,梳理目前学界的代表性成果,探索未来学术的研究空间。

1 体育跨国史研究的兴起

跨国史研究的兴起得益于历史学研究的社会转向与文化转向。自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提倡以跨国视角解读国际关系以来,跨国史研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体育凭借跨文化传播以及非政府属性,为跨国史研究提供了有利的视角。

1.1 跨国史研究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跨国”概念开始为西方史学界所使用。Ian Tyrrell^[3]在“国际史时代的美国例外论”一文中提出以“跨国史”来克服民族国家历史研究中的美国例外论。随后,Thomas Bender、入江昭等一些从事美国史和近现代国际史的学者开始明确采用“跨国史”一词。跨国史研究深受全球史研究的影响,成为史学研究“全球转向”中一个重要的流派。跨国史研究的主要观点认为,跨国史与全球史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试图超越民族国家边界,探索边界之外的往来与联系,试图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模式。刘文明在《全球史概论》中将其定义为:“跨国史既是一种以近现代和当代跨国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也是从全球视角来重新审视近现代和当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是当今全球史多元实践中的一种重要表现^[4]。”跨国史对全球史的最大借鉴就是将文化作为核心内容进行考察。全球史学者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群体之间的交往或交流,必然影响互动者的态度以及互动的结果,因此极为重视互动中的跨文化性质及其影响。

体育史学术共同体也受到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的影响。2014年,Amy Bass在《美国历史杂志》发表《学科现状:体育史和“文化转向”》,引发学术界关注。文章指出,如果将体育史的研究视野限制在体育本身,必然会忽视体育所涉及的人类社会包含的政治、文化、社会关系。体育史的研究内容绝不仅限于比赛、运动成绩、世界纪录。体育史要突破研究

视域的限制,即只关注身体或运动本身以及研究方法的限制,即一味强调定量研究的可靠性与真实性,以文化视角进行学术探索是未来体育史研究的重要方法^[5]。Rob Ruck也认为,体育史应该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学科,文化视角是体育史研究转向的重要推动力。在这股学术潮流中,跨国视角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来自欧洲、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地区的学者纷纷投身体育跨国史的研究实践,未来在这一领域必将有丰硕的成果呈现于学术界^[6]。2016年,北美体育史协会举办主题为“为体育的未来负责”主席论坛,来自英国德蒙福特大学体育历史与文化国际中心的Tony Collins^[7]教授发表《体育的历史超越体育史》主题演说,认为将体育视为一种跨国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是未来体育史研究的必然趋势。总而言之,从跨文化视角进行体育史研究在学界已经趋于共识,但关键在于以何种方法进行实践。体育跨国史借鉴了历史学领域最新的研究范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且学术界已有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出现。

1.2 跨国史视角下的国际关系史研究

将跨国史研究方法引入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旗手人物是哈佛大学的入江昭教授。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显示出蓬勃生机,而外交政策史研究却显得暮气沉沉、缺乏活力。面对学科危机,美国外交政策史研究领域多方学派上下求索^[8]。入江昭为解决学科发展危机提出的药方是从文化视角重新解读国际关系。1988年,入江昭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历史学的国际化》的主题演讲,正式将“跨国史”(international history)推向主流学术界。在演讲中,入江昭认为无论是从提升学术共同体的国际化程度还是扩展美国历史研究视野之必要,美国史研究的“去国家化”(denationalize)已是大势所趋^[9]。入江昭认为,除国家政府之间的官方高层交流外,也存在公民社会及个人以文化为载体自发形成的国际交流网络。具体而言,即便国家政治关系处于交战中或进入冷战状态,也存在着双方民众看对方国家的小说,听对方国家的音乐,共同参与国际体育赛事的情况。不论是高雅文化还是流行文化,文化性的国际关系时时刻刻都在进行,并不完全受地缘政治关系的制约。他认为尽管文化领域的国际关系没有能够构建出和平秩序,战争依然会爆

发,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文化交流毫无意义^[10]。质言之,入江昭认为人类社会持续不断的文化交流所构建的共同体并非完全受地缘政治左右。

1997年,入江昭发表《文化国际主义与世界秩序》,提出“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的概念。他认为历史上来自不同地区的个人或者群体在文化交往中形成了一种地缘政治关系之外的另一种国际关系,这种文化共同体往往被历史学家所忽视,但的确是完整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文化交往的实现途径包括人员往来,思想交流,学术合作等^[11]。入江昭并不否认地缘政治构筑的国际关系,但是他强调在高层政治交往之外,存在民间的、非政府的文化交流所形成的国际网络。入江昭在《日美战争(1941—1945)》中指出,国际事务的参与者既可以被视为权力体,也可以被视为文化体,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权力和国际文化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的专著必须包含对3方面的研究:权利层面的互动,权利层面的文化交流,以及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联^[12]。依照入江昭的解读,体育跨国史的内涵可归纳为,通过跨国体育活动还原体育跨国网络的历史构建过程。这一跨国网络被学者释义为“跨国空间”(transnational space)。“跨国空间”并非指地理空间,而是涵盖了非国家行为体以及非政府组织的网络,在此空间中培育出超越国家和族群身份的认同与忠诚^[13]。质言之,体育跨国空间培养的是对体育规则的认同,对体育精神的崇尚,对体育激情与乐趣的享受。

综上所述,体育跨国史关注民间的、非政府体育跨国行为,将体育视为一种文化载体,是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的渠道。体育跨国网络与地缘政治的互动是体育跨国史关注的核心内容。

非政府体育跨国行为获得学术界关注得益于档案的公开化。Heather L. Dichter认为,以往的体育外交研究无外乎从两个角度出发:其一,民族国家的视角即政府部门怎样利用体育实现外交意图,如“乒乓外交”;其二,民族国家对奥运会产生的重要影响,如1936年希特勒对奥运会产生的冲击。但是,随着原始档案数量的增加以及档案数字化普及,学者不仅能够掌握政府档案,同时也能够获取国际体育组织档案,新的研究范式随之出现。新研究范式要求从国内政策和体育组织的双重视角出发,旨

在更加深入全面解析体育与政治的关系^[14]。也有学者将新旧两个范式的研究特征总结为“体育外交”(sport diplomacy)和“体育实现外交”(sport-as-diplomacy)两个维度。前者指政府为实现外交目的利用包括运动员、运动队、海外巡回赛、大型赛事作为一种公共外交的手段;后者指体育组织,无论是国家内部的体育组织还是国际体育组织,在体育国际交往行为中与政府、商业、工业生产形成的复杂国际关系^[15]。就体育跨国史的研究特征而言,其研究更加倾向于后者。

除了关注非政府跨国体育行为,体育跨国史将体育视为一种文化载体。冷战结束后,加上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影响,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开始上升。文化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有两层意思:一是,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即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是如何影响其对外关系的观念、对外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二是,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关系,即不同文化间是如何接触、碰撞和交流的。体育跨国史显然属于后者。一种文化同另一种异质文化在交往过程中,因各自文化系统要素具有不同的特点,会引起两种情况:其一,由于文化要素的不相容性,文化不同会引起误会、偏见、纠纷、摩擦和矛盾;其二,某些文化要素彼此可相容,不同文化之间可以进行相互交流,实现文明互鉴^[16]。由于现代体育的跨文化属性,体育跨国史研究内容显然属于后者。此外,以往国际关系研究偏重于“高雅文化”即关注知识分子、学术团体等。冷战结束后,流行文化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促使学者将视线下移。体育作为大众文化甚至可以说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获得越来越多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学者的关注。

2 体育跨国史的研究内容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共同体构建的基本单位都是民族国家。这些国际体系的构建无一不是政治、经济、军事对抗后的结果。在这一国际体系之下,国际关系被约等于大国之间的硬实力较量,这也是以往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逻辑起点。但是,民族国家之外的另一层国际关系被忽略。在战争的硝烟和仇恨对峙的背后,是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全球意识的成长,体育成为国家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与载体。体育跨国史研究可分为双边体育交流,研

究内容为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体育交流行为;区域体育交流,研究内容为区域性国际体育组织运作下的多边体育交流行为;全球体育交流,研究内容为全球性体育组织运作下的多边体育交流行为。研究表明,跨国体育行为在促进国际间互相理解与和平事业上作出突出贡献。

2.1 双边跨国体育交流

双边国家关系一般是民族国家疆界内政治主体实施的对外关系,政府主导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合作与对抗是核心内容,对方国家成为民族国家上述力量的海外投射。民间体育交流构建的网络是对以往地缘政治双边关系研究成果的补充,属于双边关系研究范畴。

在“民族—国家”研究范式下,一般认为美日之间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大萧条”以来,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政治冲突加剧,加之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政策,进一步加深了双方政府之间的矛盾。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等倒行逆施的行为,引发美国政府的不满。一些体育界人士一度担心,日本将不会被邀请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17]。历史表明,日本不仅参加了该届奥运会,并且实现奖牌突破,在游泳项目上大放异彩。不仅如此,在体育跨国史研究范式下,美日棒球交往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日本民众对美国棒球的狂热行为加深了美国决策者和民众对日本的双重认知,即日本的侵略行径只是日本政府内部小部分激进分子的主张,日本绝大多数群众对美国抱持好感,认为美日之间不会爆发战争^[18]。事实上,棒球并没有阻止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正如入江昭所言,棒球或者其他运动项目并非摆脱了传统地缘政治的影响,棒球运动并不能左右美日关系,或影响其他国际关系,而是相应存在的各类体育社群,逐渐催生一种全球人类共同体的意识^[19]。二战期间美日之间在太平洋战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军事对抗。“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加剧,日裔美国人被指控为“第五纵队”,是袭击的帮凶。1942年2月19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9066号行政命令,将日裔美国人集中迁离,共有12万名日裔美国人被监禁在美国各地10个授权的战争拘留营中。大部分移民史学者认为,美国政府的做法是“极度不公”,与“囚禁”并无二致^[20]。美国政府嫁祸于

人的做法,是美日关系矛盾不可调和的体现。但从体育跨国史角度而言,美日之间文化交流的渠道并没有被完全阻断。在美国西海岸日本裔移民拘留营中,一代与二代日裔移民在艰苦环境中对棒球的热爱不减。他们在简陋的拘留营中清理出棒球场地,制作了木制的看台。棒球成为维护社群秩序的手段,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心理安慰,他们将棒球视为超越现实困境的梦想,梦想有朝一日能够走出拘留营并重新被美国社会所接纳。1942—1945年,棒球运动在拘留营受到极大的欢迎^[21]。二战结束后,拘留营中的日裔选手选择回到日本,为战后日美关系缓和提供文化理解的基础。综上所述,以日美关系史研究为例,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视角和跨国史视角,得出的结论虽不同,但两种结论都是以史料为支撑,都是历史的真实存在。跨国史并非要推翻前者,而是对前者进行补充,呈现更加完整的人类交往图景,同时也为学者提供未来学术探索空间。

2.2 区域间跨国体育交流

区域跨国体育交往的平台是区域国际赛事,主体是区域赛事的参与者,构建出区域内部的集体身份认同,以一个整体的区域形象向世界展示该地区发展活力,获得世界的关注,是对以往区域内地缘政治关系的补充。概言之,区域跨国体育交流属于区域内多边关系研究范畴,是较之双边关系更大的研究范畴。

以地缘政治矛盾重重的亚洲为例,东亚体育代表性国家中、日、韩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是从区域跨国体育交流史的角度去审视亚洲国家之间关系,一部体育“共有的历史”清晰可见。以地缘政治为视角的研究中,东北亚国家的矛盾在日本崛起之后加剧。但是,在跨国史视野下,亚洲地区的体育赛事不仅是维系亚洲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是亚洲国家以“亚洲身份”通往世界舞台的进路。学术界明确提出亚洲“共有的历史”观点的学者是徐国琦。他在《一战与亚洲:一部共有的历史》一书中,使用多方档案材料,还原亚洲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共有的历史经历。徐国琦^[22]认为:“虽然这些国家和它们各自与战争的联系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似之处,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次集体的共有旅程。”概言之,亚洲国家通过集体参与的国际事件,一方面,做

出各自的历史选择,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从更加宏观层次上形成共有的历史经验。这虽是历史的悖论,却呈现出国际关系的全貌。

作为亚运会前身的远东运动会(1913—1934)是20世纪上半期最重要的地区体育赛事活动。Stefan Huebner在《泛亚洲运动会以及现代亚洲的兴起(1913—1974)》中真实还原了该项体育赛事的产生、发展以及走向终结的历程。中日甲午战争一役,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在亚洲的侵略野心,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加紧对东北亚国家的侵略。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日本趁机逼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恰逢此时,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召开。但是,从体育跨国史的角度考察,中国和日本不仅共同出席,还在对方国家轮流举办。远东运动会由美国基督教青年会首倡,但是亚洲的菲律宾、日本、中国等国家通过参加该区域赛事阐释如何定义“现代亚洲”。尽管现代体育起源于西方,但是亚洲精英将现代体育作为团结亚洲的手段,创建一个更积极的亚洲形象,在精神层面可以声称自己优于西方,这足以说明亚洲国家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排斥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文明本身的抗拒。相反,它通过借用西方文明的某些元素,挑战西方并将信息传回西方,与西方文明进行互动^[23]。西方的意图和亚洲体育的在地化是现代体育在亚洲发展的两股内在动力,对塑造现代亚洲形象不可或缺。可见,在经济、军事、政治关系之外,体育确实缔造出了一个亚洲国家之间公平竞赛、团结一致、充分展示亚洲国家风采的舞台。

2.3 全球体育跨国交流

由全球性体育组织构建的体育文化系统是一个可以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相媲美的“想象的世界”。在这个想象的体育世界中,参与者遵循体育法则,尊重体育传统,尊敬曾经的体育英雄人物。体育行为以一种介入人类社会的姿态,将世界连为一体。“想象的共同体”与“想象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即民族国家与全球体育网络的关系,体育跨国史研究旨趣在于探究二者之间的历史张力。概言之,全球体育跨国交流是全球范围内的多边关系范畴,是较之于双边、区域更大的研究范畴。

一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短暂的和平。一战的胜利国构筑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为主导世界

的新国际秩序。由于该体系属于帝国主义分赃性质的结果,德国不仅丧失了海外殖民地,还需向战胜国割地赔款,导致德国民众极为愤怒和不满^[24]。1936年柏林奥运会召开在即,纳粹发表种族言论,引起国际社会质疑。与强调政治的纷争与利益冲突不同,体育跨国史研究认为,正是在上述复杂的环境下,国际奥委会成功举办了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和1936年柏林奥运会,充分证明了国际奥委会所代表的国际主义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经济大萧条,日本、意大利以及德国的侵略行为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奥运会的独立性,它仍将其规则 and 标准推及所有的参赛国。柏林奥运会期间,尽管有纳粹的种族学说,所有种族和国家的运动员仍然在同样的规则下竞赛。Keys将体育的这种特性归结为一种体育的全球霸权(sport's global hegemony)^[25]。体育在国际社会的“道德”(moral)价值是被国际关系掩盖的重要内容,体育这一价值代表了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的一种集体期望,内涵已经从促进人类相互理解维护和平扩展到保护环境以及维护人权。Keys强调,相互理解绝不是消除差异化,而是通过体育增进彼此之间的共情,因体育产生的“心有灵犀”使和平的可能性增大^[26]。当年柏林奥运会的亲历者承认,在比赛期间纳粹的好战情绪和攻击性言论从报纸上消失。以此证明,奥运会确实创造了一个拥有独立规则和国际主义议程的世界。

从长时间段观察历史,国际奥委会的确是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不断壮大。经历了因一战、二战导致的停摆,在国际奥委会的努力下,奥运会接续进行。在意识形态尖锐对峙的冷战时期,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东西方阵牌的运动员通过体育“穿越”铁幕,实现文化交流。国际奥委会作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与威信力的国际非政治组织,不仅引领了世界竞技体育的发展,在教育、环保、人权等领域促进国际合作,致力于在充满纷争的国际环境中打造出进步与和谐的新秩序。在这个新世界中,体育运动不再具有国别属性,而是人类共享的文化成果。

3 “体育跨国史”的研究方法

3.1 自下而上(bottom-up)的研究视角

“自下而上”(bottom-up)的研究视角受历史社会学影响,以马克思主义和左派史家中的拉斐尔·塞

缪尔、乔治·鲁德等人为代表,其反对从精英角度书写社会历史,倡导以地方为研究视角和被社会忽略的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27]。就社会情怀而言,塞缪尔领导的工人运动是这一历史理论的重要实践,塞缪尔关注重新诠释劳动阶层的生活和行为,反对从政治家、革命家、领导者等社会顶层精英视角过度阐释,展现了史家对于社会大众的人文主义关怀^[28]。简言之,“自下而上”倡导历史学研究从非官方论述中汲取经验和史料,进一步丰富历史资料的来源渠道,打破旧有社会精英阶层垄断史学话语的陈规,是对传统历史研究视角的“社会转向”。

“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为体育学提供研究范式变革参考,更多学者开始从体育移民、非政府体育组织等角度展开研究。Christian Ungruhe对欧洲大陆的非洲足球移民的代理网络结构展开探讨,对宏观史学中将非洲足球移民看作欧洲新殖民主义的观点提出批判,反对其中体现的权利不平等性论述,并把研究对象转移到球员个人诉求等因素上,揭示其在移民过程中的自我定位,以及希冀通过足球移民实现社会身份转型梦想的抱负,从社会流动性视角探索体育移民的中微观史学论证,探究移民行为中的移民文化和空间流动^[29]。概言之,“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为体育学领域的研究提供新范式、新理论,有利于体育跨国史的学术研究创新,是对传统政治与精英书写范式的突破。

3.2 多国、多层次档案的运用

体育跨国史研究的基础来自多国、多层次档案文献的运用。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灵魂,史料的多寡以及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价值。随着档案的开放以及数字化,为体育跨国史研究提供了保障。以美国档案为例,美国档案文献的解密一般遵循30年的规定期限。目前,美国大规模解密档案的时间下限已经到了里根政府时期。与民间机构收藏的海量档案相比,政府档案可以说是沧海一

粟。这些档案对近现代体育史研究而言,体现了目前学术界由“从上到下”到“从下到上”研究视角的转变^[30]。就中美体育跨国交往的档案而言,有以下渠道:第一,数据库档案。在国内查阅FRUS、USDDO、DNSA、AMD历史与文化珍稀史料数据库集成、ProQuest History Vault原始档案数据库等文献集和电子数据库十分便利。第二,美国政府馆藏档案。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各总统图书馆和国家安全档案馆等相关档案文献均可查阅和拍摄。第三,美国非政府馆藏档案。耶鲁大学档案、明尼苏达大学档案、春田学院档案、哈佛档案馆档案、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LA84基金会档案、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档案、德克萨斯大学档案均已对外开放。以中美体育跨国史研究为例,徐国琦在《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中,查阅多方档案,还原中美之间体育共有的历史。

表1 《奥林匹克之梦》多国原始档案来源
Tab.1 Source of original archives of “Olympic Dream”

国家	档案来源具体信息
美国	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rchive, Urbana
	National Archive, College Park, Maryland
	Gerald Ford Presidential Library, Ann Arbor, Depart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中国	Paul Ziffren Sports Research Library, Los Angeles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北京
瑞士	国家历史档案,台北
瑞士	IOC Archive, Lausanne
加拿大	Public Archive Canada, Ottawa

注:资料来源于《奥林匹克之梦》附录部分

事实上,该研究在档案方面尚有深度挖掘的空间,就美方档案使用程度而言,大学馆藏以及基金会的档案未被充分利用。

表2 中国近代体育史研究档案概况
Tab.2 A survey of research archives of modern Chinese sports history

档案所在地	档案卷宗号	主要内容
耶鲁大学	Divinity Special Collections 如 Henry Winters Luce Family Papers (RG 203) John Augustus Hartwell papers (MS 1340)等	基督教青年会人员在华档案

续表 2

档案所在地	档案卷宗号	主要内容
明尼苏达大学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如 Annual and quarterly reports of YMCA international work in China (YUSA.9-1-1) D. Willard Lyon papers (YUSA.80)等	基督教青年会人员在华档案
洛克菲勒基金会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Annual Report(1972—1980)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资助中美体育代表团互访
阿肯色大学 (费耶特维尔校区)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Historical Collection	美国国务院海外体育人员交流活动

4 体育跨国史研究的意义

2021 年,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资深专家以“国家、跨国、全球:历史研究的视野和路径”为主题召开学术圆桌会议。与会专家对该研究范式的学术价值予以充分肯定,有学者甚至提出,跨国史作为新的史学研究路径和方法,对于重构价值观、话语体系、新文科的价值重大^[31]。就目前的研究条件而言,中国体育史学术界完全有能力通过对这一学术思潮进行跟踪、探索、反思,构建体育跨国史研究理论体系,掌握学术话语权。

4.1 增强体育国际关系理论基础

近年来,随着解密档案的出现,学术界对体育外交的研究走向深入,不论是对体育外交的案例研究,还是针对一个国家体育外交政策的深入探讨,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成果。上述研究大大丰富了体育外交的内容,但是体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却没有很好跟

进。已有成果充分证明,体育在推动国际关系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其背后的国际关系理论探寻仍有很大空间。在世界政治研究中,有 4 种主要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建构主义。第一,现实主义范式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行为体,所有的政治归根结底都是权力政治。各种类型的现实主义都持有一种观点:国家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第二,自由主义范式中的社会自由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会增进了解从而减少冲突,使得国家之间不那么陌生和敌对。第三,马克思主义从经济视角理解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不断加大的全球不平等现象,认为资本主义导致全球财富分配失衡,引导国际社会关注经济不平等引发的国际危机。第四,建构主义是世界政治研究中相对较新的范式,它结合社会学研究,注重考察国际社会的

表 3 4 种研究范式基本特征
Tab.3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our research paradigms

类别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	建构主义
基本行为体	国家	国家、非国家行为体	经济和阶级	国家、非国家行为体
主要人类动机	恐惧、统治欲	恐惧、对生活美好的祈求	贪婪	追求有秩序、有意义的社会生活
行为体主要目标	所有国家追求权力与安全	行为体追求安全、财富、正义	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工人阶级追求工资与劳动条件	行为体利益是通过互动社会建构的
基本公共理论	行为体主要手段	军事实力、贸易、投资、谈判说服	财富、劳动	取决于历史和社会背景
主要互动过程	竞争	竞争与合作	剥削	取决于历史和社会背景
国际体系基本特征	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	非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	经济不平等	社会制约因素
主要理论	军事理论、霸权转移和霸权战争理论	新自由制度主义、“民主和平”论	依附理论、革命理论	结构化理论、规范演进理论

“结构”。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结构不只是单位数量的布局,还包括“主体间意义”,即共同话语、观念、习惯、规范、规则以及适当性逻辑,以上构建了单位身份,并使得单位之间以相互理解的方式互动。此种意义的社会结构塑造了认同与利益^[32]。

历史上,体育与国际关系的互动均可用上述4种研究范式进行阐释。冷战时期,美苏在奥运会上的交流带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冷战是美苏在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的全方位比拼。由于双方都掌握摧毁对方甚至全世界的武器——原子弹,促使美苏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上合作。奥运会被视为美苏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或者是替代战争,赛场成为双方向世界展示各自制度优越性的舞台。1979年,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抵制了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1984年,苏联抵制了1988年洛杉矶奥运会作为回敬。与美苏在奥运赛场的剑拔弩张相比,1971年中美关系通过乒乓球运动实现破冰。“乒乓外交”带有明显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色彩。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以及电视媒体的日渐发达,美国体育在全球扩张中追逐金钱利益的目标凸显,体育帝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商业帝国。美国商业体育文化传播最成功的案例非篮球莫属,20世纪90年代耐克公司以及美国发达的传媒产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利用新型媒体,在海外创造和重新定义美国大众文化,他们利用体育的吸引力影响了海外篮球爱好者的衣食住行甚至思维方式。针对体育商业帝国,一些学者认为美国体育商业帝国的力量已经势不可挡;另一些学者则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是美国社会“镀金时代”的重演,在商业帝国中体育充满了贪婪、欲望、腐败,偏离最初教育的本真,为了打球而打球的观念会误导青少年^[33]。综上所述,商业体育帝国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契合。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非拉国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与美苏在奥运会上的优越性竞争不同,新兴国家希望通过国际体育组织以及参与国际体育赛事,证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获得国际身份认同^[34]。换言之,体育是建构民族国家身份的途径之一。

4.2 探索体育跨国史的国际关系理论

有学者犀利地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流学派的理论依然是建立在“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之上,

这就导致本应极具现实价值的研究在全球化时代难以解读现实和预测未来。尽管欧美国家一直坐享全球化的大部分成果,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以惊人的速度在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建设、文化繁荣方面取得成绩。以现代化理论为支撑的欧美发展模式已经被证明不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唯一道路。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略两个事实:一方面,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平衡;另一方面,在民族国家层级之下的矛盾,如种族、宗教、部落之间的冲突挣脱国界的束缚,演变为持续不断的影响全球发展进程的人道主义灾难。如巴以冲突延伸到奥运会,酿成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惨剧。故此,突破“欧洲中心论”的体育国际关系理论探索是解决时代问题的必然之举。

目前,学术界能与体育跨国史形成理论互恰的是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研究。在《软实力》中,约瑟夫·奈指出,硬实力可以依托引诱(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等手段来实施运用。但有时候,即便不动用实实在在的威胁也能达到目的。这种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迂回方式,有时候也被称为“权力的第二张面孔”。软实力是拉拢,而非强迫,依靠一种不同寻常的手段(既非武力,也非金钱)促成合作,是共同价值观所产生的吸引力,以及实现这些价值观所需要的正义感和责任感^[35]。在当今信息时代,军事、经济虽是国际关系中的必要条件,却不再是充分条件,只有同时在地缘政治以及跨国事务中掌握主动权,才能实现一国之对外战略目标。

王沪宁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上发表的《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被认为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就软实力问题发表看法。文章认为,软权力(软实力)国际势能的最大限度发挥在文化方面表现为“本国文化的国际化和国际文化的本土化,在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国际认同方面下功夫”,本质上“具有非垄断性和扩散性”^[36]。原因在于,知识和文明等人类共有的财富不能被垄断。换言之,文化和知识越是传播,软实力的国际势能越大。此外,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其所产生的效能就越大。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崛起的软力量的重要构成”对内表现在形成感召力、凝聚力和认同感,对外表现在对其他文明的吸收能力,进而改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37]。有学者甚

至提出“地缘文化战略”的概念,提出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从地缘文化空间的角度,综合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和资源,应对核心挑战与威胁、维护国家利益的总体构想”^[38]。

体育作为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需要内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同时发挥作用,这就决定了从历史角度探究跨国体育交流与地缘政治关系的必要性。体育跨国史打破以往“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固定思维,从历史角度论证现代国际关系不单是西方国家军事、经济力量投射到其他地区而形成的结果,跨文化互动、互鉴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不应被忽视。随着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这可能是未来影响国际关系走向的重要力量。总而言之,体育跨国史不仅可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基础理论研究体系,而且会与文化领域中的诸多探讨结合起来,具有相应的学术应用价值。

4.3 跨国体育交往的实践启发

从体育跨国史的理论不难看出,跨国体育行为与双边、区域以及全球地缘政治关系深入。在体育跨国史研究范式下,体育跨国行为大部分为非政府的民间自发行为。但这并非表示民族国家或国际组织可以坐享民间交流带来的结果,也并非表示体育跨国行为是一种完全的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行为。百年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增大了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日趋严峻,因而人文交流并不必然促进民心相通以及实现文明互鉴。故此,体育人文交流不仅要有高度风险防范意识,还要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预判,建立风险防范化解机制^[39]。从民族国家、国际体育组织、公民个人等3个维度进行讨论,为充分发挥体育文化跨国交往的价值,以下举措值得尝试:

首先,从民族国家角度。在以往民族国家交往中,一般将主要精力放在政府高层外交,以政治现时得失为评判外交成败的标准。民间交流往往会因政治对抗或者首脑外交而被遮蔽。无可置否的是,民间交流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展开,是一种慢速的但是具有持久力的对外交往行为。因而民族国家应该充分重视体育民间交流,将持久性、包容性、开放性作为体育民间交流的核心思想,即是在政治冲突或者首脑外交进行时,民间体育交流应有有条不紊进行。其次,从国际体育组织角度出发。随着全

球化进程加快以及互联网新技术的出现,次国家组织在国际关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体育组织在其构建的体育文化权利系统中,拥有权力与权利。正如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认为以文化关系形成的网络是权力的来源^[40]。国际奥委会并非主权国家,但是其对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国家/地区奥委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拥有权力与权利。国际体育组织可以凭借其权力,对其成员不论是通过感召、资助抑或是惩罚手段,将他们团结起来。最后,从公民个人角度出发。体育作为一种以对抗形式展开却以相互理解为结果的特殊行为,有其本身的规律。公民个人在体育对外交流中不可避免带有个人情感,但应以体育精神为根本遵循,任何背离这一原则的体育跨国行为,长远而言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5 结语

现代体育对外传播中夹带有文化优越意识、资本主义商业意图、地缘政治对外扩张的野心,但是基于对体育乐趣的追求和规则的认同,所有接受现代体育的国家形成了体育共同体。正如入江昭所言,“共同体”(community)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内聚性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群体,参与者通常具有共同的成员身份和情感纽带,在共同体内部可以实现自己的需要并通过发挥自己的影响来获得自我实现,即具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sense of community)。”^[41]就现代体育的全球传播历史进程而言,基于对现代体育价值的认同形成的共同体与地缘政治并非完全一致。“体育跨国史”旨在还原服务于人类发展、有利于人类团结的体育交往的真实历史。

跨国体育行为构筑的体育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维度,通过在跨国体育空间中的交流对地缘政治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全面评估体育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一部内容更加宏大、视角更加广阔的体育史。目前,“体育跨国史”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学界研究呈现出专题论文多专著成果较少的现状且尚未形成理论体系。这对中国学术界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习近平指出,创新对外话语表述方式,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

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开展研究和讨论^[42]。“体育跨国史”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可被视为在跨国史研究基础上衍生出的一个新的体育史研究范式。

无可置否的是,“体育跨国史”研究对学者亦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多层次、多国原始文献的掌握。跨国体育交流不仅取决于政府高层的决策,也离不开体育组织以及运动员个人的推动。涉及上述机构以及个人的档案材料都可以作为学者的研究素材。伴随着档案材料日益公开化和电子化,多国档案研究已经势不可挡。这要求学者不仅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还要在档案的发掘上投入更大的精力。其次,要求学者具有国际视野的同时具备学术自觉。由于“体育跨国史”并非要消解“民族—国家”研究范式,而是以一种并存的形式对后者的研究内容进行有益补充,因此未来体育史研究依然会围绕民族国家展开。换言之,“体育跨国史”一方面要关注国际体育共同体的形成,另一方面要深入阐释体育共同体对民族国家的影响。面对目前体育史学科的危机,“体育跨国史”不仅能够成为缓解危机的路径之一,正如入江昭以“跨国史”挽救传统美国外交政策史研究一样,也可视为中国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格局、中国气派之体育史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 [1] 王立新. 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J]. 世界历史, 2016(2): 4-23.
- [2] 仲伟民. “西方中心论”的“非”与“是”[EB/OL]. (2022-06-06). <http://www.rmlt.com.cn/2022/0606/648803.shtml>.
- [3] TYRRELL I.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n ag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1, 96(4): 1031-1055.
- [4] 刘文明. 全球史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5] BASS A. State of the field: Sports history and the “cultural turn” [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2014, 101(1): 148-172.
- [6] RUCK R. The field of sports history at critical mass[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2014, 101(1): 192-194.
- [7] COLLINS T. History of sports beyond sports history [EB/OL]. (2016-03-05). <https://temp.nassh.org/the-history-of-sport-beyond-sports-history/>.
- [8] COHEN W I.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ast Asian relations: Cutting edge of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J]. *Diplomatic History*, 1985, 9(2): 101-112.
- [9] IRIYE A.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9, 94(1): 1-10.
- [10] 入江昭. 我与历史有个约会: 入江昭治史心得[M]. 杨博雅,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11] IRIYE A. Culture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M].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2] 入江昭. 权利与文化: 日美战争(1941-1945)[M]. 吴焉,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 [13] 王立新. 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 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J]. *历史研究*, 2014(1): 144-160.
- [14] DICHER H L. The diplomatic turn: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 and politic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of Sport*, 2021(38): 247-263.
- [15] BECK P. Conclusion: “Good kicking” is not only “good politics” but also “good diplomacy”, in soccer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otball since 1914[M]. ed. Heather L. Dichter,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20.
- [16] 韩召颖. 输出美国: 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 [17] GUTTMANN A. Japanese sports: A history[M].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 [18] GRIPENTROG J. The transnational pastime: Baseball and American perception of Japan in the 1930s[J]. *Diplomatic History*, 2010, 34(2): 247-273.
- [19] 入江昭. 全球史与跨国史: 过去, 现在和未来[M]. 邢承吉, 滕凯伟,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 [20] 李涟漪. 亚裔美国的创生: 一部历史[M]. 伍斌,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 [21] SAYURI G S. Transpacific field of dreams: How baseball link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peace and war[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2.
- [22] 徐国琦. 亚洲与一战: 一部共有的历史[M]. 尤卫群,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
- [23] HUEBNER S. Pan-Asian sport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sia, 1913-1974[M].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6.
- [24] 徐蓝.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J]. *历史教学问题*, 2000(3): 3-9.
- [25] KEYS B J. Globalizing sports: National rivalr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1930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6] KEYS B J. The ideals of global sport: From peace to human right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9.
- [27] GAMMON V. “Raphael Samuel, 1935-1996” [J]. *Folklore*, 1997(108): 105.
- [28] 刘耀辉, 雷芳. 大众经验、记忆与历史研究: 拉斐尔·塞缪尔的史学贡献[J]. *史林*, 2013(5): 167-176.
- [29] UNGRUHE C. Mobilities at play: The local embedding of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in west African football migration[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 Sport, 2016, 33(15): 1767-1785.
- [30] 徐国琦. 从“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角度推进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J]. 中共党史研究, 2019(4): 71-74.
- [31] 澎湃新闻. 世界史圆桌: 国家、跨国、全球—历史研究的视野与路径[EB/OL]. (2021-11-16). <http://m.thepaper.cn/uc.jsp?contid=15277236>.
- [32] 小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 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 理论与历史[M]. 张小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33] WALTER L. Michael Jordan and the new global capitalism[M]. New York: W.W. Norton, 1999.
- [34] CHA V D. A theory of sport and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09, 26(11): 158101610.
- [35] 约瑟夫·奈·软实力[M]. 马娟娟,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
- [36] 王沪宁. 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 软权力[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3): 91-96+75.
- [37] 黄仁伟. 中国和平崛起与软力量建设[R]. 国情报告(第七卷), 2012.
- [38] 潘忠歧, 黄仁伟. 中国的地缘文化战略[J]. 现代国际关系, 2008(1): 44-49.
- [39] 钟秉枢, 张建业. “十四五”时期体育人文交流面临的挑战及实现路径[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2): 1-10.
- [40]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 王福明,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41] 入江昭. 全球共同体: 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M]. 刘青, 颜子龙, 李静阁,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42] 中共中央党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话语权建构[EB/OL]. (2020-10-28). https://www.ccps.gov.cn/xytt/202010/t20201027_144309.shtml.
- 作者贡献声明:**
茹亚伟: 论文选题与撰写; 曾允菁: 论文材料整理与校对; 刘波: 论文框架设计与修改。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Chinese Practice: A Glimpse of the Research 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Sports

RU Yawei, ZENG Yunjing, LIU Bo

(Division of Sports Scienc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Recently, transnational history has drawn upon ideas of global history and formed a rising academic trend. Akira Iriye,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who advocates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the paradigm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re-examin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n-governmental actor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laims that there is another kind of human community beyond the geopolitical relations. The study deems that due to the cross-cultural and non-governmental nature of sport,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 sports behavior can supplement the previou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structed by geopolitics and present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the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and compares them with the previous geopolitical studies, highlighting the valu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sport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sports is still at the exploratory stage, which is both an opportunity and a challenge for the Chinese scholars.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adopt a “bottom-up” approach, taking multi-country and multi-level archives as research support, combining with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o as to mak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of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sports history.

Key word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spor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ports diplomacy; non-governmental transnational sports activities; non-governmental sporting exchange